

## 中国老年保障与孝文化

胡伟略

一些知名学者称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孝”是中国文化的“根荪所在”<sup>①</sup>。中国的孝文化与人口有什么联系？我认为与老龄问题有关。人口是主体，经济是基础，文化主要是知识与观念。文化，不象有形的物质财富，它是不能通过再分配的办法来解决的。社会的文化特征，必须来自于传统，并通过人们的学习、教育、熏陶、融合才能形成。现在，老龄问题在我国逐渐突出起来，由此，老年保障工作更为繁重。

我认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的

孝文化的精华，对于推进经济现代化，提高老年社会保障工作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孝文化和中华民族在远古的生息、繁衍有联系，和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同时发生。在殷代，不仅有孝的事实，而且有了孝的思想观念。在卜辞中，“孝”与“老”是相同的，金文也是如此。卜辞中的“孝”字上面象“老”字，下面象“子”字，意思就是要“奉先思孝”<sup>②</sup>。以孝送老。卜辞中有“教”字，而且是从“孝”引出来的，以孝为教。孝的思想在当时，一方面是奉孝宗祖神的意思，旨在维系殷宗族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以孝去教化其他人，无要作乱。周朝对于殷代“孝”的思想不仅继承，而且发挥，使其更趋具体化。周朝明确规定要“守孝道”。人们都能守孝道，便能使人人口繁殖，本族扩大，支族增多。当时参与政事的重要标准在于有“孝行”，以“孝”作为“忠”的基础，“惟忠惟孝”<sup>③</sup>。一个人如能孝于族，就可忠于国。周人把殷人的“德”、“孝”思想交织起来，“有孝有德”<sup>④</sup>。“孝”“德”兼全的人，才是四方楷模。

孔子首创儒家学说。儒学是中国二千多年来占

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孝”的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学在使“孝”的思想发展成为“孝文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孔子建立了一整套“仁”的思想体系。孔子的“仁”，不仅包含了“孝”，且以“孝”为基点。曾参在孔门七十二弟子中孝行最著名。孔子假曾子请问孝而答之，即在修礼、乐、诗、书、易、春秋六经之外，述著《孝经》十八章，共为七经。《孝经》序言：“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孝也是“仁”之本意。孔子学生宰予认为父母死了服丧三年太久，一年就够了。孔子说这是不仁，并斥“予之不仁也”<sup>⑤</sup>。所以，孔子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sup>⑥</sup>。孔子把孝的思想发展为养老、敬老的文化道德观念，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孔子回答子游问孝时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养是应该的，若只有养老而不敬老，与动物的有养又有什么区别呢！孔子倡导“亲亲”与“爱亲”，“爱亲之谓仁”<sup>⑦</sup>。能够爱亲和爱老，当然就能孝。这能使人们趋于厚道。墨子主张“兼爱”，他认为孔子的“亲亲”、“爱亲”是先爱己之亲，是有亲疏差别的。他提出无差别的“兼相爱”。这在当时虽难以实现，但却有意义。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孝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都是对孝以及养老、爱老、敬老思想的发挥。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sup>⑧</sup>。现在人们时常批评这句话，但在当时孟子却把孝与人口繁衍联系起来了。正因为孝有其合理的文化精华，历代都推崇孝道。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以后，儒学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独尊的局面。汉代把《孝经》列为学生必

① 钱穆 1941年11月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1949年初版，第333~334页。

② 《商书，太甲中》。

③ 《周书，蔡仲之命》。

④ 《大雅，卷阿》。

⑤ 《论语，阳货》。

⑥ 《论语，学而》。

⑦ 《国语，晋语》。

⑧ 《孟子，告子上》、《孟子，离娄上》。

读的课程之一。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发布敕令，每家必备《孝经》一本，经常宣读。汉代以来许多朝代还设立了孝经师，掌管孝事。孝的过分夸大显然是为了达到“移孝于君”的目的。至于“三纲”、“五常”等封建宗法思想，那当然是应当彻底抛弃的。但是，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则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中国孝文化思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一是赡养父母。中国早在远古就有养老制度。《礼记·王制》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学”是由天子管辖的养老和求教的场所。这说明夏以前及夏、商、周都有养老尊老制度。历代还有各级官员养老的俸禄、饮食、免赋等规定。一般平民的家庭要“谨身节用以养父母”<sup>①</sup>。二是顺父母。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歿，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sup>②</sup>。“长幼顺故上下治”<sup>③</sup>。朱熹指出，对父母的旨意，应记在心上，随时提醒，并迅速办理，回禀父母。三是敬父母。《孝经》说，以敬事长者，则顺。孔子认为平居必尽其敬。敬是对父母的礼之本意。四是对父母的生活与疾病要精心奉侍。平时，对父母的饮食起居，要关心备至。父母有病，不得无故离开，精心伺候父母的起居便溺，并要亲自迎医、验方、抓药，直到父母病愈。古代孝子更为治父母的病不惜一切，甚至毁伤自己的身体。五是为父母送终并依礼安葬。孔子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爱，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过去都讲究服丧、祭祀、守孝。中国历代都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养老、敬老、爱老的规章、法令和有关制度。这些文化制度，肯定了老年人的地位和作用。要求人们对长者要以父兄相待；与长者商谈要尊重、虚心、有礼节，甚至规定皇帝向90岁以上的长者请教要登门拜访。历代都有维护老年人的法令，还有惩罚不孝子孙的刑律。孔子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中国的孝还有所谓代替父母受刑，为父母报仇。至于传宗接代，扬名后世，以显父母，也都是中国古代的行孝之道。这些都要加以具体分析。

中国文化为什么说是孝文化呢？因为中国人的孝道，世界闻名，色彩最显。中国文化是从家族衍生来的，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的核心，“孝”为传统伦理文化的要点。中国文化以伦理为基本，崇尚无

我的精神。这种精神必然以孝弟为核心，辐射出去。中国社会重礼俗，厚情感，在民风淳厚之中，彼此相处和好。而人情厚薄，第一位的便是看家人父子关系如何。由此则国家用人亦要举“孝廉”。道德为礼俗之本，而一切道德又莫不可以从孝道引申发挥。孝道之民，构成礼仪文明之邦。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孝文化的精华，实为老龄化社会之必需。

## 二

战后世界人口急剧增长，许多国家先后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方针，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同时医疗卫生进步，生活水平提高，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平均寿命大大延长，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世界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一般说来，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就是人口老龄化；超过14%，可以说是人口高龄化。上个世纪后半期，只有法国、瑞典先后进入老年型社会。本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增加了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日本等国相继成为老年型国家。据美国人口咨询局统计，1988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发达国家为11%，发展中国家为4%，欧洲为13%，北美洲为12%，大洋洲为9%。现在世界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以2.4%的速度递增，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亚洲目前虽然老年人口的比例不高，却正在加速走向老龄化（见表1）。

表1 亚洲人口老龄化与世界对比

年份	世界	亚洲	东亚	东南亚	南亚	西亚
1980	5.9	4.4	5.1	3.5	3.8	4.6
2025	9.7	10.4	13.3	8.3	8.2	6.1

资料来源：据日本家族计划国际协力财团推计。

亚洲有几个国家或地区，正以很高的速度走向人口老龄化。日本1970年进入老年型社会，1985年老年人口比例为10.3%，2025年将达到20.3%；新加坡1984年5.1%，2025年将达到17.9%；中国1982年4.9%，2025年将达到12.9%；南朝鲜1984年为4.0%，2025年将达到11.7%；泰国1984年3.3%，

① 《孝经·庶人章》。

② 《论语·学而》。

③ 《孝经·感应章》。

2025年将达到9.1%；印度尼西亚1984年3.3%，2025年将达到8.7%。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亚洲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不仅速度快，且程度高，规模大，绝对数多。

人口老龄化的前期，不仅没有发现其对经济、社会及家庭有什么不利影响，反而有好的方面。随着出生率下降，少年儿童抚养比下降快，而老年抚养比上升慢，社会的总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就会有所下降。这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出生率下降很大之后，难以再大幅度下降，而老龄化速度加快，程度加重，社会总的抚养比就会上升。这就会产生许多老龄化问题。具体地讲：一是家庭负担的加重，抚养老人的家庭在经济上会加重负担；二是社会负担的加重，社会将增加老年人的医疗负担和老年公共设施开支，企业会因此而增加其工资成本，孤寡老人家庭数会增加，优抚费用会增多；三是政府开支的增加，养老金的财政来源会减少，养老金支出会增多，政府和企业会因解决老年人就业而增加投资。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核心，从经济方面看是负担加重问题，从社会方面看是人伦关系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解决老龄化问题，往往采取福利政策。福利过多，给经济发展造成困难，引起财政拮据，结果不少福利国家只好减少福利。而且，福利多，并没有因此使良好的养老、爱老、敬老的人伦关系建立起来，更谈不上老年人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亚洲一些国家总结了这种社会现象，较早地兴起了宣传和学习中国儒家文化的热潮。1982年，新加坡教育当局宣布让儒家伦理道德进入中学课程，并在社会上广为宣传。现在世界上兴起的新儒学认为，西方文明在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的同时，也使人类丧失了应有的道德和人性，这一弊病可以由中国传统文化来解救。

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当然要以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可单靠这一方面不行，还要有文化发展为社会基础。文化的发展，既要弘扬中国孝文化的合理部分，又要积极借鉴一切对我们有用的外来文化，还要创业有时代精神和未来预见的老龄化社会的新文化。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将有可能是同时出现的。中国的现代化，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文化现代化上来，只有最终落脚在文化现代化上，才有了真正的根基。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与现代性是有矛盾的，这表现在：尊老

贵长的旧传统与民主精神的矛盾，家庭本位与个性自由的矛盾，因循守旧与创新精神的矛盾，悠闲缓慢与重视效率的矛盾。但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健康积极的东西。虽然，中国文化包括孝文化，没有成熟的民主思想，但有“人本思想”，若加以提高，就会走向民主。虽然束缚所谓个性，但中国文化重视人格独立，强调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如再推行现代教育科学，个性发展就没有问题了。中国文化中也有丰富的革新精神，中国古代科学就很发达，只要注入新的活力，中国文化定能创造奇迹。

面对中国及亚洲人口急速走向老龄化的形势，需要建立有多种来源的养老金的老年经济保障制度，建立社会供养、家庭赡养、老人自养等形式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尊老、养老、爱老、敬老的老年文化保障制度。只有制度，还是不够的，还要解决精神文明问题。应付人口老龄化，需要建立深厚的社会道德。中国的孝文化和孝道德有许多内容值得弘扬。子女所以应该和必须赡养自己的父母，并不是仅仅为了报答，主要是履行社会义务和发展社会道德。父母为了抚养子女，曾经日夜操劳，含辛茹苦，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子女当然有责任赡养自己的父母。从社会来说，这又是一个成年公民必须履行的一种社会义务，是人们对社会应负的一种责任，同时这也是一种社会公德。父母生育子女，是为了延续人类的生命；同样，子女赡养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赡养老人，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内容，而且包括精神生活的内容，特别要注意对父母的体贴和尊敬。

### 三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包括中国的孝文化中的精华，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需要在各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孝文化。从中国大陆的情况看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在建立养老保障制度方面要弘扬中国的孝文化。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意味着必须妥善解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的生活、学习、就业、医疗、交往等问题，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其中老有所养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当务之急。就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而言，全国老年人口中只有30%左右的

人享有退休金，主要是国家公务员、国营企业和少数集体企业职工；而70%左右老年人口不能领取退休金，主要是农民等。<sup>①</sup>要很快地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国家财政难以支付，仅解决国营企事业单位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的退休金，都将面临相当大的困难。从中国大陆的实际出发，一方面要进行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老年社会保障范围；另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优秀的孝文化，发扬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尊老、养老的优良传统，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国家、社会、家庭三结合的养老制度。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福利型”的养老保障道路，又不是苏联等国家的劳动保障模式，必须把中国经济现代化与孝文化中的优秀成份结合起来，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解决老龄化的社会养老制度。

（二）在调节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社会伦理关系时弘扬中国的孝文化。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实行对外开放，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愈来愈进入市场和国内外广泛的领域，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使老年人口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关系发生变化。譬如老年保障费用的来源和分配、社会角色地位的交替等。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文化的基本内核来自于传统，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价值观念。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敬老、养老为中心内容的孝文化，在调节社会伦理关系方面，仍然是人们可以继承和发扬的精华内容。传播和发展这种文化，并注入新的内容，老龄化社会的关系就会和谐安定。

（三）在发展社区老年福利事业时弘扬中国的孝文化。文化不仅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而且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文化素养及其与周围其他人之间存在的文化交往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文化单位。这种文化单位可称为微观文化。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在的社会基层单位的文化水准、文化环境和交往方式等。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社区的老年福利事业和服务工作将比过去更加发展，社会对老年人的关心和照顾，很多方面要通过社区服务来实现。没有尊老、敬老、养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社区服务和社区老年福利事业的发展是搞不好的。老龄化社会的社区，决不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社区养老服务和福利事业的发展，社区老年人交往的增

加，都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孝文化。

（四）在家庭中更需要弘扬中国的孝文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类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有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功能。家庭养老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中国更是如此。在有老年人的家庭中，会出现赡养担当、财产继承、收入分配、生活照顾甚至老年人婚姻等问题。建设新的家庭文化，发扬中华民族子女孝敬老人的传统道德习俗，有利于解决老年人家庭中的各种问题。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的实行，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更应该发展传统的孝文化。男孩可以供养老人，女孩也同样可以供养老人。孝敬父母和子女的独立发展都要兼顾。老年人的婚姻，是老年人的正当的合法的权利，必须打破旧的传统。传统农业社会的孝敬父母和现代社会的尊老养老不尽相同。老人也要支持儿女的独立发展，帮助家庭，使他们更好地为社会工作。

（五）在老人法制建设方面应弘扬中国的孝文化。老人法规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许多国家都有老年法，譬如日本的《老人六法》。老年立法的宗旨应当是，依据整个社会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原则，保障和维护老年人口的合法权益，同时发扬敬老、养老的精神，建立老龄化社会的法律准则和文明新风。老年立法的主要内容有老年人口的退休和养老金、老年医疗保健、老年就业、老年人的生活料理和居住条件、老年服务和福利设施建设、孤寡老人的社会救济、老年婚姻等等。老年立法还应当包括对较为严重的歧视、侮辱、虐待、侵犯老人的各种丑恶行为和犯罪行为列出禁止性规定，以及有关的惩罚和判刑条款。任何侵害和虐待老人的行为都要受到道德的谴责，直至纪律和法律的制裁。无疑，在制订和实施老年法律时，必须弘扬中国优秀的孝文化，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利，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从正面来看，在养老制度改革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把符合国情的各种老年保障制度固定下来，为老龄化社会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制度。

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孝文化的精华，虽然是重要的，（下转第28页）

<sup>①</sup> 王照华：《研究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见《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第8页《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增刊。

的经济、社会价值越大,要诱导家庭少生孩子,社会必须对家庭因少生孩子带来的经济损失进行必要的补偿。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社会为达到一定的人口目标所付出的必要的经济、社会成本就越高。

其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社会为达到一定的人口目标,所能付出的经济、政策资源 的数量。要达到任何既定的政策目标,都必须投入足够的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投入与产出存在函数关系,高产出必须有相应的高投入。当然,这以一定的技术水平为前提。诱导性人口转变实现的程度,也直接取决于社会在人口控制中所投入的资源数量。在政策效果即定的条件下,社会追加投入的资源越多,对微观人口转变的条件满足的越充分,超前的诱导性人口转变实现的程度就越高,它与常规的自发性人口转变的距离也就脱离的越远。然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着社会可用于人口控制的资源数量,往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社会所能用于人口控制的资源越少,从而制约着诱导性人口转变不可能远远地脱离自发性人口转变的轨迹,这也构成诱导性人口转变的限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人均收入既定的条件下,人口压力的大小同样影响一个国家 对人口数量控制投入的数量。在资源数量既定时,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投资的边际产出。人口压力越大的国家,其人口控制投资的边际产出越高,该国便会把相对多的资源投入人口控制,这也决定了该国必然在此限度内实现相对的诱导性人口转变。

再次,诱导性人口转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还集中体现为人口转变过程的可控程度。实践已经表明,微观生育主体的生育行为具有可控性,微观生育行为围绕着孩子对家庭的成本与收益而发生变化,二者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只要这种成本与收益发生不同的变化,生育行为便可进入某种预期的状况。然而,人口转变过程并非是 完全 可控的。社会干预变量,通过对某些外生变量的调控,

对家庭系统输入了一定的控制信号,引起了家庭生育行为的一定的变化。但家庭生育行为所面对的各种外生变量,只有一部分能够由社会进行 调节 控制,而另外有一部分对生变量则属于社会不能进行控制的独立变量。这两类外生变量都构成家庭生育行为只能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但这两类外生变量对家庭的生育行为输出着不同方向的刺激信号。由社会所能控制的外生变量,在人口政策的指导下,向家庭输出种种降低生育率的刺激信号;而另外一部分社会不能控制的外生变量,则向家庭输出种种提高生育率的刺激信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决定着人口转变过程的可控程度也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口转变过程中可控制的外生变量越少,转变过程的可控程度也越低。例如,由于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必须实行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增加了家庭的生产职能和养老职能,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从而对家庭生育率的上升输出了鼓励信号。再如中国农村的婚嫁方式,在现阶段没有更多的社会选择性。一般可接受的方式是女到男家。女方家庭由于女儿嫁走而减少一个劳动力,也相应减少一份责任田,男方家庭既多了一个劳动力,又增加一份责任田和口粮田。劳动力和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女方家庭的损失与男方家庭的获益存在悬殊的差别。这种社会无法控制变量的存在,必然使家庭出现“重男轻女”的偏好。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观念落后”来解释这种偏好的顽固性,它是现实利益结构的必然结果。

只笼统地讲社会经济发展对计划生育的开展有推动或限制作用是不够的,通过对诱导性人口转变的探讨,可以更进一步认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什么途径、方式对诱导性人口转变起限制作用,从而对中国的人口转变得出正确的认识,以利于推动这一转变的完成。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

(上接第23页)但不可忽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新文化现象的研究,不可忽视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为我所能用的内容和形式,在现代

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逐步形成老龄化社会的新文化体系。

(本文责任编辑 王跃生)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